

# 李大钊研究辞典

李大钊研究辞典编委会

执行主任 宋芳春

常务主编 李权兴

红旗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四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大钊研究辞典. —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4. 4

ISBN 7-80068-726-0

I . 李… II . 李… III . 李大钊-研究-辞典 IV . K827.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1387 号

## 李大钊研究辞典

---

编著者 李权兴等

责任编辑 张素兰 封面设计 李文仲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排 版 丰南市印刷厂照排室

印 刷 唐山市人民印刷厂

787×1092 16 开 71.5 印张 20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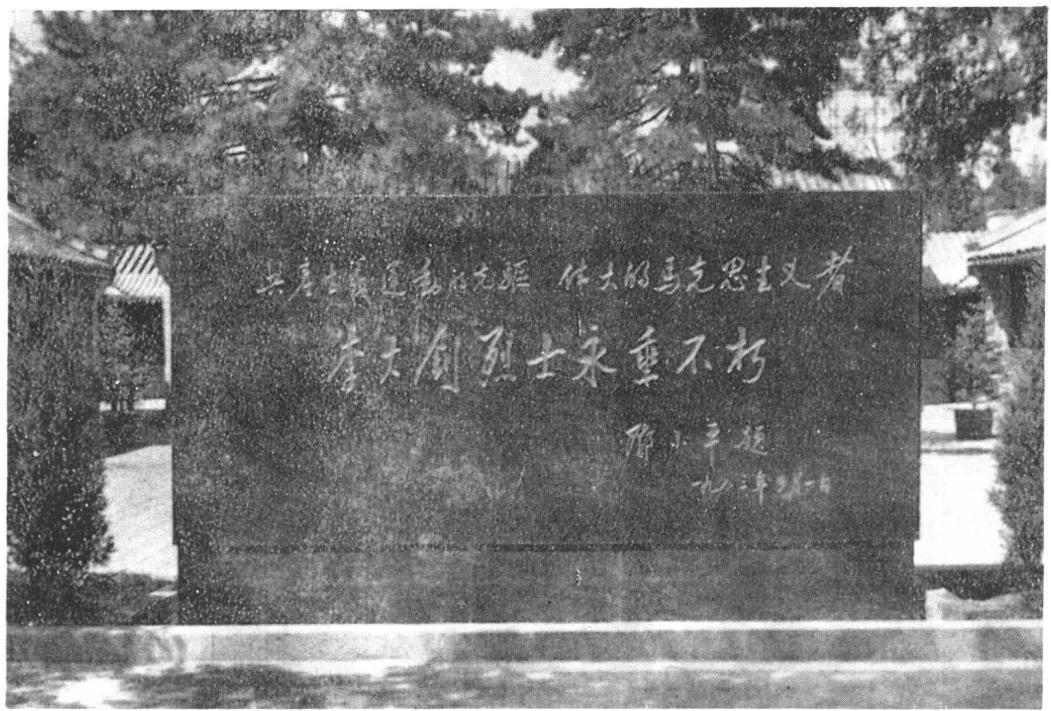
1994 年 5 月 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唐山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册

---

ISBN 7-80068-726-0/Z·229

定 价: 90 元 (精装)







在永平府中学读书时的  
李大钊同志



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  
校读书时的李大钊同志



在日本留学时的李大钊同志



主编《晨钟报》时的  
李大钊同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李大钊同志



就义前的李大钊同志

## 李大钊烈士碑文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〇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〇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〇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

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

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

# 序

——写在《李大钊研究辞典》面世之际

---

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一生。他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争取冯玉祥部西北军参加革命，以及重视军事工作和武装农民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今天，李大钊同志当年曾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他所憎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经被人民革命所埋葬，他所殷切盼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我们回顾走过的道路，缅怀革命先烈创业之维艰，更加珍视李大钊同志的思想理论遗产，他的高贵的革命品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学习的楷模和典范。李大钊精神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祖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这是因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是以对中国国情的确切把握,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从而开创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由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转变到向无产阶级学习的新纪元。他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对人民的热爱和他对革命信仰的坚定,为之流血牺牲,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

李大钊同志是伟大的革命文化的旗手,是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坚强不屈的战士。一代青年是在李大钊同志的教育和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的。李大钊同志的循循善诱,乐于助人,坦诚相待和廉洁自律,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是使曾经与之交往、接识过的人刻骨铭心的,极为尊崇和折服的。李大钊人格的力量,是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

李大钊同志在理论研究上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又是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家。他对理论研究是在渊博知识的基础上求真求善求美,把理论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求得现实可行的决策,又勇于投身于实践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他最早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的实际,是必将有其自己的特性的。正因为他掌握了这一共性个性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他的理论探索是切合中国国情实际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所以,他重视工人运动、农民问题,重视争取和教育青年,重视对旧军队的改造和主

张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一切都是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又是具有中国的特色的。李大钊同志的英年早逝，中断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深入地探索。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都是不可缺少的源头。他的那些真知灼见的论述，今天读起来，仍然有着现实针对性。

在李大钊同志的心目中总是牢记着人民大众，对革命事业无限的忠诚。他认识问题、追求真理、著书立说是在十分艰苦的历史年代之中，他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一切问题，也不可能不留下旧时代的一些思想影响，但他却是一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不知疲倦地英勇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是艰苦朴素的一生；他牺牲后，家中一贫如洗，连买口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为了支付党的活动费用和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和学生，家中常常有断炊的窘迫。这在今天，当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握有权力的今天，是一副多么明亮的镜子，可以照出那些相形见绌的不良作风和行为。学习李大钊的思想品德、生活作风、道德情操，对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在有现实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有过中断，经历了曲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83年重建了李大钊烈士陵园，撰写了《李大钊烈士碑文》。1959年出版了《李大钊选集》，1984年又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册）。李大钊思想研究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局面。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喜获发展。而在研究过程中，资料蒐集的困难是个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唐

山市李大钊研究会的同志们在 1989 年李大钊同志诞生 100 周年的时候，倡议编写一部《李大钊研究辞典》，得到了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的支持。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有朝气，有魄力，肯于苦干。今天，历时五个寒暑，一部近二百万字的辞典终于面世了。我为他们高兴，我向他们祝贺。

编写这类辞典在我国是探索性的工作。条目设置、框架设计都是开拓性的，这就难免有所偏颇。我在粗读原稿后，感到资料性很强，分篇设目也还清晰，便于检索。目前李大钊研究的工具书实在不多。因此，我认为《李大钊研究辞典》的出版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对青年学者会更有帮助。

在编写过程中，他们曾向我汇报过工作。李权兴、吴焕发同志近日又写信谈到中共唐山市委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辞典》才得以面世。并且希望我为他们的这一工作成果写个序言。作为李大钊同志的故乡人、曾受大钊同志教育成长的老战士，我写了这些话。希望李大钊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万古长青，在他的故乡，在伟大祖国生根、开花、结果，永葆其美妙的青春。



1994 年 1 月 10 日  
于北京

## 序

---

1989年10月，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见到了本书主编李权兴。听他讲了要编《李大钊研究辞典》的想法，觉得很好。当时，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可是，我想要编这样一部大书，对他们说来实在太吃力了。有资料方面的困难，也有研究能力方面的限制，更有出版方面的麻烦。从那以后，不断听到这部书进展的情况，得知确实碰到不少困难。没想到，经过5年的努力，书居然弄好了，而且框架合理，条目清晰，叙述简要，文字流畅。同时，出版问题也解决了，已排出清样，准备付印。李权兴和他的合作者的这种排除万难，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赞扬，并祝贺他们取得丰硕成果。

《李大钊研究辞典》是一部供研究用的大型工具书。一般说，研究一个历史人物，需要有文集、年谱和文献资料汇集做为依据，另外也应该有一些工具书做参考。这部辞典的出版，正是适应了此种需要。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有研究中需要的

许多知识和部分文献资料，也有著作内容的介绍和生平史料的补充，还有研究进展情况，对研究者有很大帮助，肯定会受到研究者的欢迎，但是，由于辞典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编者根据一定的材料和自己的认识编写的，所以就未必都那么准确和恰当，使用者只能做参考。如“著述题解篇”，编者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者可以参考他们的介绍和评价，但自己一定要在下功夫研究李大钊的著作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其实，使用任何辞典都应该注意这一点。

说到研究，我想顺便讲点看法。众所周知，50年代曾出现过研究李大钊的高潮。不久，由于干扰太大，基本上停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研究又恢复了，但开头进展不大。记得在1979年10月29日《文汇报》上发表的《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水平》中，我曾说过：“整个研究工作基本上没有超出‘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这种估计符合当时的实际。此后几年，由于全国形势的发展和研究者的努力，到1984年李大钊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时，形成了新的高潮，并一直持续到1989年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但这个高潮在近几年逐渐减弱，除李大钊家乡的研究者继续保持原有的势头之外，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李大钊的文章越来越少。据我了解，除其他原因之外，许多研究者觉得没有什么新的题目可研究，特别一些后起的研究者的研究不少是炒冷饭，说别人早已说过的话。今年筹备李大钊诞辰10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征集论文方面费了很大劲，就是这种研究不景气现象的反映。那么，怎样才能把

研究引向深入呢？如果不讨论非学术因素的问题，只就研究本身而言，我以为深化的途径应该是紧密结合现实，105周年学术讨论会所列主题“李大钊与现代中国”的用意也在于此。但我在看报上来的文章时，发现有些文章，仅在最后挂上一句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之类的话。这样做很不好，实际上歪曲了结合现实的含义，而且容易出现观点上的失误。如研究李大钊的早期民主思想，最后加上一句有现实意义的话，就会使人误解包括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思想对今天也有用，岂不荒唐。我想，要达到紧密结合实际的目的，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对思想的研究做具体分析：哪个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而在今天则已过时或是不对的；哪个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而在今天仍然是对的或可以借鉴的。对那些在今天有用的观点，要分析它为什么有用，用在什么范围内，怎样用效果更好。这样做相当不容易，既要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又要研究现实，并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简单重复以往研究的成果，写出新意；这样做就会发现不是没有问题可研究，而是研究不完，研究不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应该把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放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分析李大钊的现代化意识、现代化思想和观点以及革命活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贡献。这样，就可以用历史的连续性把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同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如指导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

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成的毛泽东思想，而最早引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最高层次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正是李大钊。以这个思路为前提，研究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就会把历史和现实结合。总之，把对李大钊的研究引向深入是个难题，需要不断探讨。

话说回来了，不管怎样研究，都需要把研究的条件准备好。条件基本上齐备了，才能使研究者做出更多的贡献。《李大钊研究辞典》填补了研究条件之不足，其作用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日益显露。当然，这部辞典由于编写者水平和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不少缺点，可惜已来不及改。对此，作为本书的顾问，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希望研究者在使用时能提出意见，供编写者参考，以便日后有机会再版时修改。

以上一些话，很普通，没有什么深意。权为序。

1994.7